

## 20 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型 及其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

颜 廷 张秋生

(江苏师范大学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江苏 徐州 221116)

[关键词] 澳大利亚; 华人研究; 移民政策; 新移民

[摘 要] 论文分析了二战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 20 世纪末以来澳洲移民政策的演变, 认为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改革与转型, 主要是在经济理性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 并逐渐形成以技术移民为核心的移民选择体系。移民政策转型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华人新移民数量持续稳定增长、地区来源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技术移民比重持续走高、女性移民越来越多、华人新移民地区分布趋向多元化、华人新移民回流潮日趋明显等方面。

[中图分类号] 634.3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4)03-0020-14

### Transformation of Australia's Immigration Policies since the Late 1990s and Its Impact on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YAN Ting ZHANG Qiu-sheng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Center,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Key words:** Australia; immigration policy; new Chinese immigrants

**Abstract:**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provide their insights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stralia's immigration policy since the late 1990s from the traditional emphasis on family reunion to a stress on the immigrants'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particularly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to the nation.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is policy change is the guideline of economic rationalism.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new policy up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cluding its growth, its demographic distribution, its members' originating areas, its occupational composition, and its gender ratio.

[收稿日期] 2014-03-09; [修回日期] 2014-07-18

[作者简介] 颜廷(1977—), 男, 江苏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讲师, 校聘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史、华侨华人研究; 张秋生(1953—), 男, 江苏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史、澳大利亚华侨华人。

\* 本项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与亚洲新移民问题研究(20世纪70年代至今)”(项目批准号: 11BRK002) 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海外少数民族华人文化适应、身份认同与社会组织研究”(项目编号: 2014-GM-108) 的中期研究成果。本项研究亦受江苏师范大学 2012 年度校科研基金项目“近十余年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革及其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项目编号: 12XWR020) 的支持。感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感谢编辑部为拙文修改付出的辛勤劳动!

作为典型的发达移民国家，移民政策是澳大利亚调节宏观人口发展，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重要工具。其移民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澳大利亚移民的地区来源、族裔构成、文化素质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一直是华人移民重要的目的国，其移民政策的变化，亦对华人新移民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学界已经有了较多研究。<sup>①</sup>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关注21世纪以前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与华人新移民问题，而对近十余年澳移民政策和华人移民问题，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未能从政策转型的视角对20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整体变革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近十余年澳洲华人新移民的变动情况，关注情况也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随着近十余年中澳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华人对澳移民亦呈高速增长态势。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考察和分析澳洲移民政策变动与华人对澳移民趋势，对于把握中澳之间人力资源竞争、合作和交流态势，了解澳洲侨情变化和发展趋势，提升侨务工作质量和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 一、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澳洲移民政策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基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进入了一个频繁调整与变革的时代。

### （一）种族同化移民政策

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移民。这一时期的移民政策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引进移民力度大，且在移民问题上举国一致，内部鲜有争议。当时，为了满足战后国民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两党政治都支持大量移民的政策，极少有公共舆论对移民计划表示不满。”<sup>[1]</sup>在大量移民政策下，从1947年7月1日到1969年6月30日这二十余年间，澳大利亚总共接受208.06万移民，<sup>[2]</sup>平均每年接受移民10万人左右。其二，在立法层面逐渐放弃了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1956年澳政府规定，凡已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非欧洲人有资格取得国籍；澳大利亚公民的非欧洲人直系亲属亦可获得永久居留的入境许可。1957年规定，获临时入境许可者凡在澳居住达15年即可取得公民权，1966年又减为5年。1958年，移民法又取消了移民英语听写能力测试。在新政策下，从1956—1962年，有2907名有色人种获得澳大利亚国籍；到1969年，该数字达到1.1万。<sup>[3]</sup>作为一个有着浓厚种族歧视传统的国家，这在当时是极富震撼力的。

然而，尽管政府废除了种族歧视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却并未全面清除移民政策中的种族主义因素。作为种族歧视政策的替代品，澳大利亚主张实行种族同化的移民政策。1949年前工党政府总理亚瑟·卡尔韦尔宣称“我们的目标是将所有来我国的移民澳大利亚化……时间越快越好。”<sup>[4]</sup>前自由党政府总理哈罗德·霍尔特也要求“我们新来的移民必须在观点和生活方式方面迅速成为澳大利亚人。”<sup>[5]</sup>前移民部长比尔·斯内登说得更直白“我们应该有一种单一的文化，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生活，相互理解，有着共同的愿望。”<sup>[6]</sup>这就意味着，

---

① 比较重要的学术专著有 *The Story of Sydney's Chinese* (Shirley Fitzgerald, 1997)、*Ancestors: Chinese in Colonial Australia* (Jan Ryan, 1995)、*Citizens: Flowers and the Wide Sea* (Eric Rolls, 1996) 以及1998年张秋生和黄昆章两位先生各自所著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此外，还有一批比较重要的学术论文，诸如《二次大战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和华人社会的发展》（张向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4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技术型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张秋生、孙红雷 《世界民族》2006年第6期）、《战后澳大利亚对华移民政策的演变（1945—1995）》（张秋生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美国与澳大利亚对华移民政策的差异及其成因（1820—1996）》（王春、王幼林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从陆克文—吉拉德政府的移民政策改革看澳大利亚未来移民政策走向》（张秋生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1期），等等。

新来澳洲的移民，必须放弃原有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尽快适应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方式，从而完全、彻底地融入一个同质、单一的澳大利亚社会中。在种族同化移民政策下，由于欧洲人语言、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与澳洲相近，容易融入澳洲主流生活，因而直至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政策执行之前，澳洲移民绝大多数仍然来自欧洲。1960—1961年度欧洲移民占澳洲移民总数比例为90.9%；1965—1966年度比例为88.1%；1970—1971年度为74.1%。<sup>[7]</sup>可见，澳洲移民政策虽然在理论上废除了种族歧视，但移民实践仍然有比较浓厚的种族选择意味。

尽管在二战后的澳洲政府看来，移民种族选择的做法成本更低，更容易形成单一、稳定的白人主流文化，然而，其缺陷也非常明显：其一，因可供选择的移民来源狭窄，使得移民整体素质水平不高。为确保足够的移民数量，二战结束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澳洲移民政策的门槛都很低，是否专业技术人才并非移民的关键因素。这就导致战后二十余年里澳大利亚入境移民素质普遍不高。以1960—1970年这十年为例，这期间进入澳洲工厂企业的646 550名移民中，仅64 971名是工程技术人员，另有188 752名熟练工人。<sup>[8]</sup>这与当代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数量动辄十余万之数相比，相去甚远，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洲经济和社会建设的进程。其二，移民来源过度依靠欧洲，导致澳洲在移民选择方面缺乏充分的主动性，受欧洲经济、政治变化的影响太大，造成澳洲移民人口供给不稳定。在这两点因素作用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澳洲政府不得不启动了移民政策的去种族化进程。

## （二）移民政策去种族化与技术移民选择制度改革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因澳洲移民选择面太窄，移民种族选择的做法开始遭到冲击。这一时期欧洲国家战后恢复迅速，经济持续繁荣，前往澳洲的移民急剧减少。1969—1970年度欧洲对澳移民一度达到14.6万余人的历史最高峰，而1974—1975年度即骤降至5.4万余人，降幅高达62.6%。<sup>[9]</sup>移民数量急剧下滑，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迫使联邦政府不得不寻找新出路。1973年，工党惠特拉姆政府公开宣称要采取无种族、肤色和国别背景歧视的移民政策。1975年，自由党弗雷泽政府也重申了多元文化政策，指出这一政策“鼓励人们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sup>[10]</sup>在多元文化政策指导下，联邦政府开始改革移民政策，尝试以移民的职业技术能力为选择标准，推动移民选择的去种族化。随之移民部便设计了澳大利亚第一个技术移民评估体制“结构化选择评估体制”（Structured Selection Assessment System, SSAS），以甄选海外技术人才。但因该体制有太多关于移民申请者主观因素的判断（如同情心、积极主动性），不够严谨，容易沦为种族移民选择的工具，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1978年，澳大利亚人口和移民委员会宣称，澳洲人口出生率在不断下降，迫使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和改革移民政策。当时，自由党弗雷泽政府一方面宣布放松对家庭团聚移民的控制，采取欢迎移民的政策，以增加移民人口供给；另一方面则公布了九条移民政策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移民安置的永久性原则<sup>①</sup>和移民选择的“非歧视性原则”——实际上再次重申了种族移民政策的终结。为了有效贯彻“非歧视性原则”，避免“结构化选择评估体制”在移民选择上的主观随意性，1979年1月，澳大利亚移民部引入了“量化多因素评估体制”（The Numerical Multifactor Assessment System, MUMAS）。与前者相比，该体制删除了对移民申请者主观因素方面的评估，强化了就业能力、教育背景和语言能力等“客观”因素的评估，并进行打分，据此确认其移民资格，从而首创了澳洲移民史上移民申请的“积分制”。根据这一移民选择体制，政府主要从社会、教育、经济等因素评估移民申请者是否符合移民的“一般资格”，<sup>[11]</sup>从而寻找到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力资本”，而不考虑其种族和肤色。这一移民选择体制的不足在于，它主要综合考察移民申请人的综合素质水平，未能突出其专业技术能力因素。

<sup>①</sup> 即一旦政府批准移民申请，则申请者即获永居签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澳洲欲改变以往过度依赖矿产、能源等资源行业的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即围绕高科技产品和服务重塑澳洲经济,而这需要大量可靠的专业技术人才。为此,澳洲将招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那些年轻、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事业有成的人视为经济转型是否能够成功的重要机遇。<sup>[12]</sup>在这一想法驱动下,1982年,澳洲政府又推出了新的“移民评估体制”(Migrant Assessment System)。这一移民选择体制不仅考察移民申请者的教育背景、英语能力,尤其重视申请者的专业技术能力,并相应给予更多的积分,从而弥补了1979年“量化多因素评估体制”的缺陷,使得澳洲技术移民选择体制初具雏形。该移民选择体制推出后,吸引了大批亚洲移民,澳洲移民政策的种族选择因素进一步减弱了。

在多元文化政策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坚持以移民的职业技术能力而非种族身份作为移民选择标准,推动移民选择去种族化,显著地改善了澳洲移民状况:其一,扩大了移民地区来源,使得移民数量不断增长。1979—1980年度,每年度的海外移民人数从惠特拉姆政府执政时期有史以来的低水平增至80,748人,1981—1982年度更增至118,031人的高水平。<sup>[13]</sup>其二,技术移民数量有显著增长。1983—1984年度,技术移民比例仅为全部移民人口的18.6%;1986—1987年度则增至28%;1989—1990年度再增至43.8%。技术移民人口的绝对数量则由1983—1984年度的9800人,骤增至1989—1990年度的52,700人,增幅达437.8%。<sup>[14]</sup>技术移民的大幅度增长,适应了澳洲经济结构转型对专业技术人才的渴求。

在执行“非歧视性”的以职业技术能力为移民选择标准的政策过程中,澳洲社会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联邦政府却不为所动。弗雷泽政府明确拒绝在移民选择上重新回归依靠“传统来源”国家或地区的建议。1983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阐述新移民政策时也强调,排除有色人种的移民政策是跟澳大利亚同亚洲间关系发展的情势相冲突的。<sup>[15]</sup>80年代初以后,随着许多曾在白澳体制下服务的官员逐渐卸任,移民种族选择政策也随之被彻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 (三) 移民政策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洲政府一直以职业技术能力作为移民选择标准,推进移民政策的去种族化,丰富了澳洲移民的种族和地区来源,推动了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这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利益。然而,这一系列移民政策改革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和不足,即改革解决了澳洲移民供给的宏观问题,却忽视了对澳洲移民类型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对澳洲移民的“质量”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这使得澳洲移民政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遭到了巨大挑战。

二战结束以来,澳洲移民便一直以人道主义移民和家庭团聚移民为主,直至20世纪80年代,这种状况也未发生根本性改变。1983年,工党霍克政府上台执政,不仅在历史传统的惯性下继续执行大量移民政策,尤其对家庭团聚移民更持宽容态度,对人道主义移民亦抱有极大同情心。在其8年多的任期内,一方面澳洲海外移民数量持续攀升,从1983年9.3万左右的一般移民水平,到1989年增至14.5万的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人道主义移民和家庭团聚移民等非技术移民人口比重仍然过大。以1983—1984年度为例,本年度家庭团聚移民占当年移民总数的61.9%,人道主义移民占22.5%。这两类移民共占当年移民总数的84.4%。1990—1991年度,这两类移民仍超过当年度移民总数的半数多。<sup>①</sup>由于人道主义移民和家庭团聚移民数量、比例庞大,且普遍缺乏专业技能,但又要平等地享受澳洲社会福利,这就引起了公众的普遍不满。人们认为,大量移民涌入澳洲,会抢走本地人的工作、降低工资水平和生活条件。在这种怀疑心理下,人们甚至反对引进技术移民,认为这会使政府和企业雇主不再愿意花钱培训企业员工,<sup>[16]</sup>从而影响本地技术人才的成长。

<sup>①</sup> 根据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Citizenship,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leased April 2013)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澳洲经济长期低迷,加剧了公众对移民政策的批评。在欧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强力竞争下,20世纪80年代澳洲经济转型失利,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失业率长期高企,1983年达10%以上,直到1989年才降至6%多一点,1992年又因经济萧条,失业率再破10%。<sup>[17]</sup>这一切令人们看不到希望,导致公众对移民政策的批评甚至超出经济层面,上升到了种族问题的政治高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移民正在削弱澳大利亚社会团结一致的状态。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教授(Geoffrey Blainey)甚至宣称,澳大利亚“正变成一个部落国家”和“面向全世界开放的巨型公寓”。<sup>[18]</sup>1988年8月1日,在一档广播访谈节目中,自由党反对派领袖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也认为“减少一些亚洲移民”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内聚力。<sup>[19]</sup>

在公众的强烈反对下,1991年上台执政的工党基廷政府逐步收缩了移民规模。基廷执政之前,澳洲1990—1991年度移民数为12.7万人,之后迅速下滑,至1993—1994年度已骤降至不足7万人,减少了42.7%。<sup>[20]</sup>然而,这并未扭转经济深度低迷的趋势。1991年,澳洲失业率已经达到11%的历史最高点,<sup>[21]</sup>直至1994年失业率仍高达10.5%。<sup>[22]</sup>而在1996年霍华德政府执政之前,经济衰颓已导致澳洲约30%的人口在官方公布的人均贫困线以下。<sup>[23]</sup>这意味着单纯移民数量的扩张与缩减,对澳洲经济发展已失去调节意义,未来澳洲移民政策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才可能对经济的恢复与繁荣有所贡献。

## 二、经济理性主义与移民政策的转型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改革与转型,主要是在经济理性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

### (一) 经济理性主义与菲茨杰拉德报告

一直以来,在澳大利亚,“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m)一词只是偶尔被人们所使用,直至1991年才成为一个学术专有名词。经济理性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以狭义上的效率和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成功的手段,而无视政府本应对公共部门和福利国家所应承担的传统经济责任。<sup>[24]</sup>在移民政策领域,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减少财政开支,同时尽可能多地从移民身上获取经济收益,并尽可能少地承担责任。在澳大利亚,经济理性主义的移民实践早有经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移民选择体制,无不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强调技术移民之于澳大利亚的经济贡献率。为了确保家庭团聚移民的经济生产能力,不至于因养老、医疗等问题给澳洲纳税人带来过大的压力,弗雷泽政府时期即已要求家庭团聚移民申请者必须提供经济担保。1982年,为了缓解越来越膨胀的移民财政压力,提高移民经济收益率,弗雷泽政府决定,不再对除难民以外的移民提供经济资助,从而终结了延续150年的移民资助历史。<sup>[25]</sup>

虽然澳洲移民实践不乏经济理性选择的先例,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官方的一份调查报告才首次从经济理性视角探讨移民政策改革问题。当时因公众对移民政策争议颇多,1987年霍克政府任命由华裔学者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领导的移民政策建议委员会(CAAIP)对移民问题展开调查。政府本希望这项调查会对政府的移民政策提供有力支持。然而,委员会却报告说,如果无法说服普通公众相信大量移民政策与其利益息息相关,这个政策就不可能继续推行下去。报告称,“在公众心目中,移民计划与民族利益无关,政府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sup>[26]</sup>因此,报告建议,应放弃对家庭团聚移民和人道主义移民的人文关怀,转而强调对移民“质量”的经济理性关注。<sup>[27]</sup>这实际上是要求将移民政策重点转向引进被视为“人力资本”的技术移民。若采纳这一建议,将意味着政府必将以经济理性主义为指导,展开新一轮大规模的移民政策改革。此外,报告还要求加强移民财政控制,最大限度地节约移民开支,并推动移民决策和管理的自动化和专业化。

《菲茨杰拉德报告》对澳洲移民现状的分析及改革建议可谓切中时弊,然而,因其批评多元文化政策和家庭团聚移民政策,遭到了政府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的调查,也不为工党政府所喜。报告发布

之后，工党政府除在个别移民政策上作了局部性调整外，不再对人道主义移民直接发放永居签证，而代之以为期四年的临时保护签证，以及对新移民享受社会福利实行6个月的延缓执行期等，几乎未有大的改革动作。《菲茨杰拉德报告》事实上被雪藏，直至1996年联盟党政府执政。

## (二) 经济理性主义指导下的移民政策改革

1996年，澳大利亚大选。受多年执行多元文化政策和大量移民政策之累，工党传统选民——蓝领和下层白领阶层纷纷倒向了联盟党，致使工党落败，<sup>[28]</sup>联盟党霍华德政府上台执政。在移民问题上，尽管澳工商业界认为“……有关移民的争论正偏离正道，且认为支持移民的声音应该加强”，<sup>[29]</sup>然而，为安抚公众在移民问题上的激动情绪，兑现大选承诺，联盟党政府最终废除了20世纪80年代的欢迎移民政策，且多次重申，移民计划是为澳大利亚国民利益而不是为了移民或种族社团利益服务的。<sup>[30]</sup>在这一政策预期下，主要依据《菲茨杰拉德报告》的基本精神，联盟党政府执行了有关移民选择和安置方面的紧缩政策改革。

1. 严格控制移民开支，限制移民福利。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移民应该享有平等的公共待遇，以保证他们能跨越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sup>[31]</sup>然而，在多元文化政策反对者以及经济理性主义支持者的激烈批评下，霍华德政府再次将新移民可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等候时间延伸至两年，以节省移民开支。此外，政府要求，在获得正式签证前，移民或其担保人需预先支付一笔费用，以购买债券的形式存入联邦银行。一旦此类人需要依靠领取救济金生活，则政府可先期使用这笔预存费用支持其生活，从而减少联邦的移民经济风险。在新政策下，以前一些新移民所享受的特别福利待遇（用于帮助那些经证明没有经济来源的人），也受到了限制。申请者须证明在到达澳洲后，生存环境发生了不好的变化（例如，妻子与其担保人丈夫离婚了），且新入境移民不能以找不到工作为借口申请特别福利救济。此外，以往新移民免费享受的一些公共服务，如成人英语培训，也须自付费用。仅此一项，澳洲政府就节省了大量财政支出：1995—1996年度，节省财政开支280万澳元；两年后，即1997—1998年更节省1170万澳元。

2. 严格限制家庭团聚移民和人道主义移民。一直以来，非技术移民都是澳洲移民主流。这类移民普遍英语语言能力欠缺、专业技能缺乏、经济贡献率低，却又平等地享受社会福利，这既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新移民政策严格限制这类移民。根据规定，对于配偶移民，除非是长期婚姻关系，否则政府只批准初次被担保移民者两年的临时签证；若要获得永居签证，必须证明其婚姻关系“真实且长期存续”。有事实婚姻关系者提出永居申请前，还须证明婚姻关系已存续一年以上。对于父母移民，因联邦参议院拒绝立法限制父母移民，联盟党政府便利用行政自由裁量权，通过大量削减父母移民签证数量的方式来减少此类移民。20世纪80年代，每年父母移民签证达1万份；20世纪90年代早期，每年仍有7 000名父母获得签证，但到了后期，政府每年只发放不到3000份签证。政府对家庭团聚移民的严格限制，导致此类移民总量在1997—1998年度便跌至31 300人的历史低谷。<sup>[32]</sup>

在人道主义移民政策方面，1981年以来，澳大利亚即按计划接纳一定数量的难民或即便不符合严格的联合国对难民的定义但其人身权利确实遭到剥夺的外来移民。1995—1996年度，澳大利亚接纳此类移民的数量达到了15 050人的历史高峰点，但从联盟党执政开始到1999—2000年度，人道主义移民直降至9 960人的较低水平。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不稳，为了避免伊拉克、阿富汗等地难民无节制地涌入澳洲，澳大利亚在2001年出台了“太平洋决议案”，规定拦截任何载有避难者的船只，禁止进入澳大利亚领海，并指引其驶向愿意受理避难申请的太平洋国家。<sup>[33]</sup>尽管该政策饱受批评，但澳洲人道主义移民数量始终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每年规划接纳人道主义移民数量都稳定在1.2万~1.4万人之间。<sup>[34]</sup>

3.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化技术移民选择体系。改革之前，澳大利亚先后执行了三套技术移民选择体制，即“结构化选择评估体制”、“量化多因素评估体制”和“移民评估体制”。在

这些移民体制下，移民的专业技能是否匹配劳动力市场需求，并未纳入考评范围，容易导致人才浪费，加剧低端就业市场的竞争。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引进技术移民，新制度引入了目标元素，开列了一份职业技术需求表（SOL）。任何职位如未列于表单，如医生或大学教师，则此类从业者不能申请移民。该表单还根据各类技术人才紧缺状况，将所有职位按照可积分60分、50分和40分的标准分成几个职业类别，以尽可能多地引进真正属于澳洲急需的紧缺技术人才。对移民申请者而言，必须拥有拟申请职位所需的专业技能或知识，所持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文凭获得机构认证，且英语语言考试合格，才能获移民签证。新的技术移民选择机制更贴近市场需求，对移民申请者的技术素质要求也更严格和明确。不仅如此，为了确保技术移民符合劳动力市场需要，1997年联邦政府甚至建立了外部评估制度，以便更好地选择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术移民。

4. 极力推动技术移民。霍华德政府执政伊始，为应对高失业率，一度执行传统的削减移民政策，以1997—1998年度为例，当年移民计划数仅为67 930人。<sup>[35]</sup>不久之后澳洲经济“奇迹”的出现，改变了政府思维模式。在亚洲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1998年澳大利亚GDP增长4.8%，高于欧洲和美国，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3%的目标范围内，1999年失业率又降至7%，为近十年历史最低点，且有不断下降趋势。<sup>[36]</sup>这一经济成就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方面，公众要求削减移民数量的呼声大幅降低，2001年和2004年联邦选举时，认为移民计划应该收缩一些或大幅度收缩的选民比例已经从90年代的50%分别降至36%和34%；<sup>[37]</sup>另一方面，也使得澳洲工商界更加理直气壮地批评政府的削减移民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较低移民水平已“对大多数的商业和工业带来了不利影响……。”他们认为，澳洲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胜，必须大幅度提高技术工人的市场供应量。他们甚至以促进澳洲宏观人口发展目标为借口，批评政府仅根据劳动力市场短缺情况来制定移民政策太局限了。<sup>[38]</sup>可见，工商企业界更愿意将移民视为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希望，而不是负担。在工商企业界推动下，21世纪初，联盟党政府将大力推动技术移民作为此后移民工作的中心，开始了更加积极的移民改革步伐。主要有三方面举措。

一是增加技术移民配额。2000—2001年度引进独立技术移民22 380人，2001—2002年度为29 880人，2005—2006年度增至49 860人，2007—2008年度更猛增至54 180人。雇主担保移民也从2000—2001年度7 510人的引进额度，缓增至2004—2005年度的13 020人。2005年以后，因全球经济好转，澳洲出现严重的技术人才短缺，澳洲政府宣称，今后将重点发展雇主担保移民。<sup>[39]</sup>2005—2006年度这类移民便增至15 230人，2006—2007年度增至16 580人，2007—2008年移民计划更猛增至22 800人。此外，为平衡边远地区对技术人才的强烈需求，地区担保移民政策也从无到有，发展迅速。2003—2004年度地区担保移民仅1 630人，2005—2006年便达到8 020人，2007—2008年度则计划引进8 000人。

二是放开留学生永居签证。以往留学生须离澳后方能以海外住址申请永居移民。该政策曾遭工商实业界点名批评，被认为会造成澳洲需要的技术人才尤其是会计和计算机人才流失海外。<sup>[40]</sup>为此，2001年移民部设计了留学生在岸签证项目，鼓励留学生完成学业后获取永居身份，要求其在完成学业的6个月内提出申请，否则这项权利即告失效。以前毕业的海外留学生则须拥有技术职位需求表中可获60个积分的职位的文凭证书，但与普通申请者不同，他们无需相关工作经验。该签证项目执行第一年（2001—2002），联邦政府便向申请人发放了5480份签证。这个数字在2003—2004年度上升到7 700份，2004—2005年度上涨到14 441份，2006—2007年度更猛增至19 352份，而2007—2008年则是17 552份。

三是推动临时移民项目的发展。与欧洲国家不同，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坚持引进永居移民，极少使用临时海外劳动力。虽然政策允许雇主担保技术人员临时入境就业，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保条件还相当苛刻，担保者须证明在本国找不到合适的人从事这项工作。而改革之后，根据新的457临时工作签证政策，企业可随意担保长期商务签证的技术人员来澳工作，最长

时限4年,且不需要对本国人从事这项工作的可能性或对被担保者的资格条件进行任何评估。雇主们反响热烈。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持457签证的年度申请人数为8,000~9,000人,步伐相对比较谨慎。但到2003—2004年度,签证人数就已涨至24,316人;2006—2007年度,签证人数已上升至46,680人,2007—2008年度则达58,050人。<sup>[41]</sup>根据假日工作自主计划(The Working Holiday Maker Program),<sup>①</sup>来澳短期务工者数量亦急剧攀升。2006—2007年度来澳人数达到了134,612人次的创纪录水平,这是过去十年间此类人员入澳总人数的两倍。<sup>[42]</sup>此外,通过技术人员临时居住签证入境临时居住和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也迅速增长。不仅如此,2005年以来,为了更有效地吸引海外技术人才,澳大利亚政府还放松了临时入境签证转换为永居签证的控制,降低了针对有在澳工作经验者优先者所执行的永久入境雇主担保计划所要求的英语和技能水平条件,从而为澳洲吸引海外人才开辟了一条高效而便捷的途径。

### (三) 移民政策改革的影响和意义

在经济理性主义指导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20世纪末以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结构性变革,在制度设计上越来越强调移民的经济收益率,最大限度地压缩移民财政支出,同时尽可能地挖掘移民的经济潜力,这使得澳大利亚移民选择越来越倾向于技术移民,并直接影响到澳大利亚移民结构的变化。改革之前,非技术移民是绝对主流,以1993—1994年度为例,当年技术移民仅为澳洲移民总数的29.1%。改革之后,2000—2001年度技术移民比例即增至47.4%,2002—2003年度为54.77%,2005—2006年度则增至61.97%。<sup>[43]</sup>这与改革之前相比,可谓天渊之别。故而,有学者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家庭移民在非人道移民计划中占优势转向技术移民成为非人道移民主体,这一转变是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变化中的一个主要方面。”<sup>[44]</sup>这意味着,经过十年左右的改革,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实现了全面转型,形成了一种以技术移民选择为核心的新移民政策体系。之后,两任工党政府又对这一移民政策体系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以更精确地适应澳洲经济发展需要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如减少独立技术移民配额,大幅度增加雇主担保类移民配额;提高州及领地担保移民权限;启用批量海外人才引进制度“企业移民协议”(Enterprise Migration Agreements)和“地区移民协议”(Regional Migration Agreements);改革积分测试制度,引入新的技术移民选择系统(SkillSelect);改革商业移民政策,以吸引中国企业家的财富,等等。这使得从20世纪末以来逐渐形成的、在经济理性主义指导下的新移民政策体系逐渐走向成熟,从而为21世纪初以来澳洲经济的持续繁荣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 三、移民政策转型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型,在推动技术移民成为澳洲移民主流的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非欧洲移民数量的迅猛增长,从而使21世纪初以来澳洲移民的地区来源结构、族裔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语言习惯等更加多样化,有力地推动了多元文化社会建设的发展。而作为澳洲多元文化社会中的重要成员,移民政策的转型对华人新移民亦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 (一) 华人新移民数量持续稳定增长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因澳洲经济持续衰退,政府大幅度压缩移民计划,致使华人新移民

---

<sup>①</sup> 作为一项国家间互惠计划,该计划允许19个国家的年轻人(年龄在18~30岁之间)可以在澳洲渡工作假期,最长时限为1年。这些利用假期临时来澳工作者填补了澳洲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的空缺,比如农业收割、旅游活动、餐饮等等。2006—2007年度工作假日自主计划承担了相当于6.9万个全职工作的年工作量,却为澳大利亚创造了8.2万个工作岗位。与澳洲签订互惠协议的国家(地区)主要在欧洲,但也包括加拿大、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



数量下滑,从1990—1991年度的2万多人直降至1993—1994年度的6,963人。1995—1997年移民数量井喷,两年内超过3万人,并非正常移民计划执行的结果,而是因为1994年春,主要出于政治因素,工党基廷政府决定,1989年6月20日之前抵达澳洲的1.9万余名留学生及其9,500名亲属获准定居,其余留学生8,000余人如符合年龄、资历等相关条件,也可获准永久居留。<sup>[45]</sup>华人年度移民数量真正持续大幅度增长是在1999年以后。因澳洲政府在强调技术移民的前提下重新实行大量移民政策,2000—2001年度,华人新移民人数达到16,358人的历史较高水平,随后两年略有下滑,2003—2004年再度冲至16,789人的历史高峰,2004—2005年度移民达19,911人,2007—2008年更增至24,211人,2006—2007年联盟党霍华德政府下台前夕又冲至25,139人的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工党连任的数年中,年度华人新移民数量仍持续增长,至2011—2012年度已经达到30,174人的历史最高值(见表1)。这一数字与十年前相比,增长了122%。相应地,华人新移民总数亦从1996年的16.5万人迅速增至2011年的48.5万人。在这十五年中,华人新移民增长率高达193.7%。<sup>①</sup>

## (二) 华人新移民地区来源构成发生重大变化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尤其香港地区移民,更独占华人新移民总数的六成半。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改革与转型,加之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迅猛,且政府因私出国政策亦逐渐放开,来自大陆地区的华人新移民数量猛增。1994—1995年度,大陆移民仅占当年度澳洲华人新移民总数的42.6%。不考虑1995—1997年因政治因素导致的大陆新移民突增,从1997—1998年度开始,大陆移民比例已超半数,为51.1%,1998—1999年度即增至64.3%,2002—2003年度又增至75.1%,2007—2008年度增至87.6%,2009—2010年度更增至90.6%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反,由于大陆移民的挤出效应,港台地区华人新移民数量则不断下滑,其所占年度澳洲华人移民数量比例亦呈直线下降趋势,至2009—2010年度港台地区华人移民已仅占澳洲华人移民比例的9.2%,为历史最低水平(见表1)。可见,21世纪以来,澳洲华人新移民地区来源结构已发生颠覆性变化,中国大陆已成为澳洲华人新移民主导性的地区来源。

## (三) 技术移民比重持续走高

因长期种族主义移民政策的影响,澳洲华人新移民数量极少,因而20世纪70年代执行多元文化政策以来,华人极少通过亲属移民入境澳洲,而只能走技术移民路线,故而与欧洲白人移民不同,华人技术移民比例一直比较高,1990—1991年度、1991—1992年度甚至分别高达89.7%和86.4%。此后,因华人技术移民人数日增,越来越多的配偶、子女或父母随之以亲属移民身份入境澳洲,华人技术移民比例逐渐下滑,1992—1993年度即降至61.0%,1995—1996年度甚至降至33.7%的历史最低水平(参见表2A)。然而,这种情况随着移民政策的转型,非技术移民受到严格限制,技术移民占华人新移民比例再度走高。2000—2001年度,华人技术移民比例为53.8%;2001—2002年度为58.7%;2002—2003年度为61.9%;2003—2004年度为65.2%;2004—2005年度为66.4%;2005—2006年度为71.9%(参见表2B)。此后几年技术移民比例有所下滑,但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sup>②</sup>,且表现稳定。

<sup>①</sup> 此数据是根据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viliza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Released April 2013) 中 “Settler arrivals, 1975 - 76 to 1994 - 95”、“Settler arrivals, 1995 - 96”、“Permanent additions, 1996 - 97 to 2011 - 12” 等三个模块数据综合分析、整理而成。

<sup>②</sup> 本部分数据分别采自澳大利亚移民部2002年发布的“Australian Immigration Consolidated Statistics, Number 21, 1999 - 2000”和2013年发布的“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这两组数据统计方式有差别,前者主要统计离岸申请移民数据,后者除离岸申请移民数,还包括在岸申请移民数,故而双方数据上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在关于1996—2000年的年度华人新移民数据上有明显区别。2013年发布的“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的统计数据就比2002年发布的“Australian Immigration Consolidated Statistics, Number 21, 1999 - 2000”的统计数据大。但笔者认为,虽然数据统计路径不同,但对于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洲华人技术移民比例的变化情况,并无实质性影响。

表1 1990—2012年华人新移民年度统计

单位: 人

年份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中国澳门	华人移民 总数	大陆移民 所占比例	港台移民 所占比例	澳洲移民 总数
1990—1991	3256	13541	3491	256	20544	15.8%	82.9%	121688
1991—1992	3388	12913	3172	240	19713	17.2%	81.6%	107391
1992—1993	3046	6520	1434	140	11140	27.3%	71.4%	76330
1993—1994	2740	3333	785	105	6963	39.4%	59.1%	69768
1994—1995	3708	4135	794	68	8705	42.6%	56.6%	87428
1995—1996	11247	4361	1638	124	17370	64.7%	34.5%	99139
1996—1997	9945	4191	2354	113	16603	59.9%	39.4%	104551
1997—1998	5453	3445	1704	69	10671	51.1%	48.3%	94198
1998—1999	7307	2251	1724	78	11360	64.3%	35.0%	101016
1999—2000	9659	1729	1857	55	13300	72.6%	27.0%	111310
2000—2001	11496	1893	2930	39	16358	70.3%	29.5%	131162
2001—2002	9888	1511	2140	53	13592	72.7%	26.9%	121174
2002—2003	10033	1741	1540	38	13352	75.1%	24.6%	125862
2003—2004	13316	2070	1344	59	16789	79.3%	20.3%	149992
2004—2005	15997	2534	1321	59	19911	80.3%	19.4%	167319
2005—2006	18084	2162	1226	54	21526	84.0%	15.7%	179807
2006—2007	21820	2101	1165	53	25139	86.8%	13.0%	191907
2007—2008	21208	1784	1173	46	24211	87.6%	12.2%	205940
2008—2009	23692	1587	1012	47	26338	90.0%	9.9%	224619
2009—2010	25366	1541	1040	44	27991	90.6%	9.2%	208921
2010—2011	29397	1967	1012	63	32439	90.6%	9.2%	213409
2011—2012	26747	2027	1352	48	30174	88.6%	11.2%	245277

资料来源 “Permanent additions, 1996 - 97 to 2011 - 12”, i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viliza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Released April 2013.

表2 (A) 1990—2000年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分类统计

单位: 人

年份	家庭移民	技术移民	特殊移民	总移民数	技术移民比例
1990—1991	2162	18786	1	20949	89.7%
1991—1992	2226	14195	2	16423	86.4%
1992—1993	3192	5008	7	8207	61.0%
1993—1994	2926	4224	8	7158	59.0%
1994—1995	3879	4447	7	8333	53.4%
1995—1996	11478	5831	9	17318	33.7%
1996—1997	5542	7018	3	12563	55.9%
1997—1998	3141	5976	0	9117	65.5%
1998—1999	3653	4959	0	8612	57.6%
1999—2000	3455	4341	0	7796	55.7%

资料来源: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 Australia Government, *Australian Immigration Consolidated Statistics*, Number 21, 1999 - 2000。表中数据根据 “Persons Granted Migration and Humanitarian Visas Offshore” 相关数据资料分析整理而成。

注: 此表移民人口数据仅为离岸申请移民数据。

#### (四) 华人新移民男女比例持续失调, 女性移民越来越多

从1972年执行多元文化政策以来, 澳洲华人新移民一向以男性移民为主, 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 男性移民依然占主导地位。但从1996年前后开始, 由于澳洲移民政策越来越重视考查英语语言能力, 导致语言能力相对较好的女性华人移民越来越多, 并逐渐超越男性移民数量, 且

呈小幅度稳定增长的态势。作为目前澳洲最大的华人新移民来源地，1996年中国大陆对澳移民女性比重已达51.9%，2001年增至53.3%，2006年又增至54.8%，2011年更达55.6%。中国香港华人新移民情况大致相似。1996年香港女性移民比重已达51.2%；2001年为51.5%；2006年为51.9%，2011年为52.3%。中国台湾女性移民占台湾移民总数比例亦从1996年的55.2%，稳步增至2011年的57.6%（见表3）。实际上，不仅华人新移民性别比例失衡，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等情况亦类似，而日本、菲律宾、韩国、泰国等国移民性别比例失衡现象尤其严重，个别国家女性移民数量甚至几乎超过男性移民的一倍。<sup>[46]</sup>

表2 (B) 1996—2012年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分类统计 单位：人

年份	家庭移民	技术移民	特殊移民	总移民数	技术移民比例
1996—1997	6409	6607	40	13056	50.6%
1997—1998	3925	6065	19	10009	60.6%
1998—1999	4594	5241	35	9870	53.1%
1999—2000	4325	4525	2015	10865	41.6%
2000—2001	3699	6300	1709	11708	53.8%
2001—2002	4326	7178	715	12219	58.7%
2002—2003	4698	8103	293	13094	61.9%
2003—2004	5685	11097	232	17014	65.2%
2004—2005	5753	11507	62	17322	66.4%
2005—2006	5943	15321	30	21294	71.9%
2006—2007	7040	16881	4	23925	70.6%
2007—2008	7077	16871	9	23957	70.4%
2008—2009	9062	15220	5	24287	62.7%
2009—2010	11207	15390	48	26645	57.8%
2010—2011	9976	21474	32	31482	68.2%
2011—2012	10716	16523	50	27289	60.5%

资料来源 “Migration Program outcome by stream and citizenship, 1996 - 97 to 2011 - 12”, i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vilization, Australian Government,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Released April 2013.

注：此表移民人口数据为在岸申请移民和离岸申请移民合并数据。

#### (五) 华人新移民地区分布趋向多元化

长期以来，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因其国际化程度高、文化多样性突出、城市生活更加包容，且经济发展机会多、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一向是华人新移民入境澳洲的首选生活城市。然而，21世纪初以来，珀斯、阿德莱德、堪培拉、霍巴特、达尔文等非热门首府城市的华人新移民亦越来越多，增长率远远超过了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2001年澳洲人口普查时，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华人新移民人口为200,191人，较之1996年增长了18.7%；而珀斯、阿德莱德、堪培拉、霍巴特、达尔文等城市华人新移民人口为19,394人，较之1996年仅增长9.4%。然而，2006年人口普查时，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华人新移民增至255,769人，增长率为27.8%；珀斯等非热门首府城市华人新移民则增至29,543人，增长率高达52.3%。2011年人口普查时，悉尼等三大首府城市华人新移民为344,633人，增长率为34.7%；而珀斯等非热门首府城市华人新移民则增至51,689人，增长率达到惊人的75.0%（见表4）。尽管就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而言，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仍然是华人新移民工作、生活的首选城市，珀斯、堪培拉等非热门城市华人新移民呈更高的增长速度，依然能够清晰地呈现

澳洲华人新移民聚居地选择方面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表3 华人新移民性别比例统计

单位: 人

中国大陆						
年份	男性	女性	总人口	男性比例	女性比例	男女比例
1991	41310	36572	77882	53.0%	47.0%	113.0%
1996	53429	57580	111009	48.1%	51.9%	92.8%
2001	66617	76163	142780	46.7%	53.3%	87.5%
2006	93279	113310	206589	45.2%	54.8%	82.3%
2011	141595	177375	318970	44.4%	55.6%	79.8%
中国香港						
1991	28263	29245	57508	49.1%	50.9%	96.6%
1996	33414	35016	68430	48.8%	51.2%	95.4%
2001	32533	34589	67122	48.5%	51.5%	94.1%
2006	34532	37270	71802	48.1%	51.9%	92.7%
2011	35778	39177	74955	47.7%	52.3%	91.3%
中国台湾						
1991	5667	6898	12565	45.1%	54.9%	82.2%
1996	8751	10796	19547	44.8%	55.2%	81.1%
2001	10153	12265	22418	45.3%	54.7%	82.8%
2006	10700	13669	24369	43.9%	56.1%	78.3%
2011	12128	16498	28626	42.4%	57.6%	73.5%

资料来源: 主要根据澳洲人口普查资料 200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Expanded Community Profile* 中的“X01 Country of Birth of Person (a) by Age by Sex”数据模块,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Expanded Community Profile* 中的“X01 Country of Birth of Person (a) by Age by Sex”数据模块, 以及 200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Time Series Profile* 中的“T07 Birthplace (Countries) by Sex”数据模块中的数据资料综合分析而成。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站 <http://www.abs.gov.au/>。

表4 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基本分布情况

单位: 人

首府华人新移民分布								
年份	悉尼	墨尔本	布里斯班	珀斯	阿德莱德	堪培拉	霍巴特	达尔文
1991	76207	34642	11564	6647	4499	2657	461	729
1996	106330	45777	16548	8371	5270	3011	481	590
2001	125570	55562	19059	9332	5695	3258	533	576
2006	153703	76304	25762	12500	10528	5053	928	534
2011	193903	113829	36901	21647	18866	8342	1709	1125
各州华人新移民分布								
	新南威尔士	维多利亚	昆士兰	西澳洲	南澳洲	首都区	塔斯马尼亚	北领地
1991	81044	36118	14949	6980	4674	2657	723	810
1996	111514	47262	21373	8963	5457	3012	750	647
2001	130812	57160	24054	9701	5891	3258	776	660
2006	160451	78804	32413	13003	11064	5065	1348	607
2011	203286	117785	46666	23171	19610	8342	2365	1331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各州及其首府人口普查数据综合而成。见澳大利亚统计局历年人口普查数据 (<http://www.abs.gov.au/>)。

#### (六) 华人新移民回流潮日趋明显

20 世纪 90 年代, 澳洲华人新移民回流还比较少, 1996—1997 年度华人新移民数为 16 603 人,

而回流人口仅为 2039 人，回流移民比例为 12.3%。1997—1998 年度移民回流比例增至 22.1%，但绝对数字并不高，为 2361 人，仅比上一年度多回流了 322 人。随着移民政策的转型，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下滑，移民福利大幅缩减，在华人新移民数量屡创新高的大背景下，回流人口亦逐年走高，并形成了一股华人新移民回流潮。从 1998—1999 年度起，华人新移民回流渐成涨势。当年回流移民增至 3344 人；1999—2000 年度，回流移民 4085 人；2000—2001 年度，回流移民 4891 人；2001—2002 年度，回流移民 4939 人；2002—2003 年度，回流移民 4658 人。之后，华人新移民回流人口一路飙升。2003—2004 年度，回流移民突破 6000 人大关，达 6126 人；2005—2006 年度，回流移民达 7165 人；2008—2009 年度，回流移民达 8174 人；2010—2011 年度，华人新移民回流达 9492 人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华人新移民回流数字不断攀升的情况下，1998 年以来移民回流数量占年度移民数量的比率亦居高不下，始终在 30% 左右徘徊（见表 5）。换言之，近十余年来，在澳洲，每三个华人新移民中，大约有一人回流原籍地（亦有少部分人再度移民第三国）。当然，目前这种回流质量尚不高，其中仅 30% 回流人口为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sup>[47]</sup>

表 5 华人新移民年度回流情况 单位：人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中国台湾	回流总数	年度移民数	回流比例
1996—1997	798	955	25	261	2039	16603	12.3%
1997—1998	1054	1023	23	261	2361	10671	22.1%
1998—1999	1427	1375	26	516	3344	11360	29.4%
1999—2000	1802	1585	35	663	4085	13300	30.7%
2000—2001	2430	1725	32	704	4891	16358	29.9%
2001—2002	2424	1743	23	749	4939	13592	36.3%
2002—2003	2129	1735	31	763	4658	13352	34.9%
2003—2004	3126	2025	23	952	6126	16789	36.5%
2004—2005	3736	2077	27	958	6798	19911	34.1%
2005—2006	3843	2291	31	1000	7165	21526	33.3%
2006—2007	3962	2138	29	951	7080	25139	28.2%
2007—2008	4480	2211	37	1006	7734	24211	31.9%
2008—2009	4999	2196	37	942	8174	26338	31.0%
2009—2010	5550	2407	39	1012	9008	27991	32.2%
2010—2011	5796	2669	36	991	9492	32439	29.3%

资料来源: *Emigration 2010 - 11 Australia*,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11; *Emigration 2006 - 07 Australia*, 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2007. 见澳大利亚统计局网站 <http://www.abs.gov.au/>。

总之，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以来十余年，华人新移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澳洲，呈现出一系列与以往不同的变化特点，这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从重视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传统转向以技术移民为重点的巨大跨越与转型密切相关。当专业技术能力越来越严格地成为移民选择的主要标准时，则意味着澳洲移民政策越来越公平、公正，更少种族选择之嫌，从而为世界各地人们移民澳洲提供了更加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而近十余年来华人新移民数量的迅猛增长与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典型例证。

[注释]

[1] [18] [26] [29] [30] [40] [41] Bob Birrell, “Immigration Policy in Australia”, in John Higley, etc. (ed.), *Nations of Immigrants, Australia and the USA Compared*, Cheltham, UK: Edward Elgar, 2009, pp. 72, 74, 74, 79, 76, 80, 78.

[2] [8] 王宇博 《20 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 年第 3 期。

- [ 3 ] Alan Richardson , *British Immigrant and Australia: A Psycho-social Inquiry* , Canberr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1974 , p. 23.
- [ 4 ] [17] 斯图亚特·麦金泰尔著 潘兴明译 《澳大利亚史》,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9 年, 第 205、224 ~ 227 页。
- [ 5 ] 里查德·怀特著 杨岸青译 《创造澳大利亚》,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 202 页。
- [ 6 ] Geoffery Bolton ,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the Middle Way , 1942 – 1995* , Melbourn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pp. 106 – 107.
- [ 7 ] [9] “Settler Arrivals , January 1959 to June 1975” , i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Citizenship , Australian Government ,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 Released April 2013.
- [10] Kenneth Riuett , *Australia and the Non-white Immigrants* , Melbourne :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1975 , p. 194.
- [11] [16] [21] [24] [25] [27] [31] James Jupp , *From White Australia to Woomera , The Story of Australia Immigration* ,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 pp. 44 , 145 , 50 , 141 – 142 , 44 , 49 , 152.
- [12] Ross Garnaut , *Australia and the Northeast Asian Ascendency* ,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 1989 , p. 292.
- [13] “Settler arrivals , 1975 – 76 to 1994 – 95” , i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Citizenship , Australian Government ,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 Released April 2013.
- [14] [43] “Migration Program Outcome by Stream 1983 – 84 to 2011 – 12” , i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Citizenship , Australian Government ,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 Released April 2013.
- [15] 沈己尧 《海外排华百年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 第 90 页。
- [19] [28] Katharine Betts , *The Great Divide: Immigration Politics in Australia* , Sydney , NSW: Duffy and Snellgrove , 1999 , pp. 290 , 39.
- [20]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 , Australian Government , *Australian Immigration Consolidated Statistics* , Number 21 , 1999 – 2000.
- [22] 孙晖明 《澳大利亚经济》, 《国际资料信息》1994 年第 10 期。
- [23] 刘樊德 《保琳·汉森今何在?——保琳·汉森及其一族党的历程》, 《当代亚太》1997 年第 7 期。
- [32] [33] [42] [44] Graeme Hugo , “Flows of Immigrants 1993 – 2008: Australia” , in John Higley etc. , *Nations of Immigrants , Australia and the USA Compared* , Cheltham , UK: Edward Elgar , 2009 , pp. 25 , 23 , 25 , 25.
- [34] “Humanitarian Program Visa Grants , 1977 – 78 to 2011 – 12” , i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 Australian Government ,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 Released April , 2013.
- [35]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 Australian Government , *Historical Migration Statistics* , Released April , 2013.
- [36] 陈力 《1999 年澳大利亚经济回顾与展望》, 《国际经济合作》2000 年第 2 期; 吴蔚 《1999 年澳大利亚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 《经济研究参考》1999 年第 98 期。
- [37] Catherine Betts , “Dissatisfaction with immigration grows” , *People and Places* , Vol. 16 , No. 3 , 2008 , p. 21.
- [38] Richard Pratt , “Dynamism , immigration and history’ s lesson about the source of Australian prosperity” , in Steve Vizard , etc. ( ed. ) , *Australia’ s Population Challenge* , Camberwell , VIC: Penguin Books , 2003 , p. 43.
- [39] Amanda Vanstone , “2005 – 06 ( no-humanitarian ) program” , *Media Release* , 14 April ,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 Canberra , 2005.
- [45] 张秋生、孙红雷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的社会特征》, 《历史教学》( 高校版) 2007 年第 3 期。
- [46] “T08 Country of Birth of Person ( a ) by Sex” , in Australia Bureau of Statistics , 201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 Time Series Profile*.
- [47]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 Citizenship , Australian Government , “Country Profil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Canberra* , 2012.